

第一部分

国际金融政策的争论——以日美贸易摩擦为中心

第一章 国际贸易与国民经济

1. 国民收入的计算与经常性收支

近年，日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两国经常性收支的不平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经常性收支开始出现赤字，到 90 年代，这一经常性赤字进一步急剧扩大。2000 年，美国经常性收支赤字比 1999 年增加了 31%（这是近三年来的连续增加），达到 4353 亿美元，超过了 GDP（速报值）的 4%。尽管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赤字的增加也随之停止，但赤字水平仍然居高不下^①。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盈余比率不断下降，日美经常性收支的不平衡仍然是两国之间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围绕日美经济政策来理解两国经常性收支的问题。

在根本上，经常性收支不平衡不外乎是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因此应该从如何调节进出口的观点来讨论这一问题。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出口/进口都受到各种相互关联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的影响。所以，经常性收支平衡问题应该看做受到收入、投资、消费这些政策变量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现象，如果只把它当做某一单个产品的进出口的这种微观方法则是不全面的，这正是把国际收支当做冰山一角的原因所在。

^① 参见美国商务部 2001 年 3 月 15 日的报告。

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首先，简单理解一下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①，以下简称 GNP）的概念。GNP 是指国民在一定时期（一般计算口径和时间单位为一个经济计划年度）创造出来的新价值（附加价值）的总和。因为 GNP 的计算是以“一定时期”作为计算的时间单位，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因为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所以，已经计入 GNP 中的二手商品即使再次被买卖交换，其中的差值也不算入 GNP 中（比如，某生产厂家以 A 价格买进原材料，然后以 B 价格卖出，在这一产品交换过程中，B 减去 A 的值的差才能作为新价值计入 GNP）。此外，股票、证券交易中的资本收益也不包括在内^②。因为 GNP 要计入的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所以家庭主妇或者非货币劳动的家务劳动等也不包括在内。

这样，GNP 的计算就存在各种技术问题^③。但可以从生产、收入以及支出三方面宏观加以计算。重要的是，这一技术性的方法应该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三个数字都是一致的。即三方等价原则，生产 = 收入 = 支出的关系成立。

- ① 从国民在国内的生产这一观点出发，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 GDP）指 GNP 减去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取得的利润或所收到的海外侨民汇款等后得到的余额。随着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来自海外的红利收入等的重要性增加了，但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GDP 与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并不大（在发展中国家，来自侨民的汇款等所占的比例很大，所以两者的差额有时很大）。在下列议论中，根据使用 GNP 或 GDP 的不同，有必要调整一下经常性收支（CA）的定义。在本书中没有必要把两者严格分开讨论，所以一般用 Y 表示。
- ② 在这个关系下，不把土地或住宅的交易算在 GDP 中。即使卖掉土地得到利益，也只不过是储蓄在买卖双方发生了转移。在这一点上，比如，政府采取的所谓综合经济对策中，在计算波及 GNP 的经济效应时，从发布的对策总额中扣除了用于购买土地的那部分金额。比如，1992 年 8 月第 1 次为 10.8 兆日元（占 GDP 的 2.3%），这是在企业范围内的对策。经济刺激效应则根据扣除购买土地、政府金融机构的贷款后剩下的公共投资额 5.8 兆日元（包括减税在内）来计算。
- ③ 家庭购买的汽车作为家庭的支出成为消费，企业购买的汽车作为投资被计算在内。个人住宅的投资被看做是个人以企业的名义而投资的部分。此外，下列归属价值的计算也是技术问题之一。比如农民自家消费的农产品或公司支付的实物津贴（比如免费的住宅）等，如果把它们当做从市场购买的东西，就计算在内。同样，如果把房子租出去，那就把它的市场价值作为服务计算在内。

换言之，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某种形式转化为收入，收入又通过某种形式全部支出。在这一等式关系中存在着难以理解之处。比如，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不完的话会怎样？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比如，在只生产小麦的单一经济下，农民完成了 100 个单位的生产量，把其中的 20 个单位的生产量储存起来作为明年的投资，即使这样，农民的收入仍然是 100 个单位生产量计入 GNP，但是从支出来看，其中 20 单位的生产量储蓄是为第二年所做的投资。这样，即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售完，从支出来看剩余的部分也是作为库存投资算在收入中^①。

世界 GNP 的分布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各国生产总值，日本经济总量排在什么位置上，或者说日本经济在世界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有必要从这些角度重新认识日本。

关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位次，世界银行根据统计发表了题为“经济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的报告^②。在这一报告中，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约为 4 兆美元），但按照人均量则排在第 7 位（约合 32 000 美元）。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 8.8 兆美元，大致相当于日本的 2 倍，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值则为第 10 位。

再从东南亚各国的情况比较一下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韩国总产值不到日本的 10%，拥有约 2 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约为日本的 3%；拥有 6 000 万人口的泰国与印尼大致相同；菲律宾是日本的 2%；人口超过 12 亿的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日本的 28%；约有 10 亿人口的印度则为日本的 10% 强。也就是说，日本的经济规模接近于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主要国家总和的 2 倍。根据这一统计，现在俄罗斯的总

① 与没有剩余的服务联系起来考虑，会更加容易理解。假设医生从患者那里赚到了 75 美元，那医生的生产、收入都是 75 美元，而从患者的角度考虑，则是支出 75 美元。

② World Bank, 《世界发展指数 200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1）。这种关于 GDP 的基本观点，即对市场创造的新价值的计算方法中，除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外，还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它是否能确切表示一国的“富裕程度”或“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银行正在讨论关于自然环境、教育制度等人文资源的评价指标（叫做绿色指标），但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结果。而且，现拥有 3.8 亿万人口的欧盟各国正作为经济圈不断统一，这一趋势今后值得瞩目。

产值位居世界第 16 位，大致相当于韩国或荷兰（与此相比略微不足）的水平^①。

从世界经济总体来看，日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3.5%，美国占 29.6%，两国加起来大约占了世界总产值的 43%，而日本人口为 12 700 万人，美国为 27 800 万人，两国人口只不过是世界总人口 60 亿人的 6.7%。

$$S = I$$

在上述前提下，与收入等额的支出可以分为生活支出（称为民间消费）和企业支出（称为民间投资，即由设备、住房、库存资金构成）。首先，在不考虑政府部门的支出情况下来看它们之间最简单的关系： $Y = C + I$ ，进而得出 $Y - C = I$ 。在这里， Y 代表收入， C 代表民间消费， I 代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国家所有的储蓄（ S ）可定义为收入减去消费的值，所以， $S = Y - C$ 因此，根据上面两个公式可得出 $S = I$ 。像这样，在一个国家没有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结构中， $S = I$ 。

$$CA = S - I + (T - G)$$

在一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中，因为要进行国际贸易，所以为了能正确计算 Y 值，就必须在支出总额（ $C + I$ ）的基础上，加上出口额 Ex 再减去进口额 Im 。 $Ex - Im$ 表示经常性收支，往往用 CA （因为其英文为 Current Account）来表示。此外，如果把政府部门（ G ）的经济活动也考虑在内^②，就成为 $Y = C + I + G + CA$ 。公式两边同时减去税收（ T ），再减去消费（ C ），就成为 $Y - T - C = I + (G - T) + CA$ 。左边为税后收入（ $Y - T$ ）减去消费 C 所得的值，等于储蓄 S 。由此得出 $S = I + (G - T) + CA$ ，也就是， $CA = S - I + (T - G)$ 。

换言之，一国的经常性收支为民间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再加上财政收支

①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来算，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 PPP 的基础上，美国仍是第一位，中国位于第二，成为大国（包括香港经济在内共 4.6 兆美元）。其次是日本居第三位（3.2 兆美元）。然后是印度（2.2 兆美元），德国（1.9 兆美元）。此外，在 PPP 的基础上，人均量美国占第四位，日本则为第 15 位。

② 总理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编写的《国民经济计算年报》（2001 年）第 7 页中写到：1999 年 $GNP = 513.7$ ， $C = 289.3$ ， $G = 83.2$ ， $I = 134.1$ ， $库存投资 = -0.8$ ， $经常盈余 = 7.9$ （兆日元）。

的总和。而且，如下所述， $T - G$ 即政府收支等于政府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政府储蓄 S_g 被定义为政府税收（严格地讲是负补助金，假设它为 T ）减去政府消费支出 C_g 所剩余的那部分。政府储蓄与投资的差额是储蓄减去投资的差。由此得出，政府的储蓄投资差额 $= (T - C_g) - I_g = T - (C_g + I_g)$ 。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 $G = (C_g + I_g)$ ，所以，由政府的储蓄投资差额最后可以算出政府的财政收支，即年收入额减去支出额，也就变成了 $S_g - I_g = T - G$ ①。现在把政府、民间综合起来计算国民收支就成了 $S_n - I_n = CA$ ，即国民储蓄 - 国民投资 = 经常性收支：

$$S_n - I_n = CA$$

这一公式表明了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开放经济形态下，没有必要让 I 与 S 保持一致， I 大于 S ，或相反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表明了，在开放经济下，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 并不是 S 有多大就有与之相抵的 I （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是很常见的。典型的例子是现在日本储蓄率较高而国内投资水平低）。

(2) 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 I 并不只局限于国内储蓄 S （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常见的。 I 表示该国的资本储蓄水平，所以，一般来说， I 的多少限制着该国经济的发展）。

(3) 如果 I 与 S 有差额，那么这部分差额就通过 CA 的加减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部分。

I 与 S 的相互关系

但是，综观世界各国的现实经验后，我们发现 S 大的国家 I 也大，这一点在国际经济学上还没有得到充分证明②。作为一般考虑的主要原因，不用参照东亚的例子便可知，致使 S 变大的经济或社会的主要原因（如刺激

① 日本国民收入的统计将“一般政府”的支出分为投资和消费，所以可直接用 $S - I$ 来算。与此相似，大多数国家计算国民收入时把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区别开来。但是，美国在统计时却没有把它们区别开。计算美国国民收入时，把政府支出假定成不用于扩大国家资本积累的那一部分支出。这里所说的政府部门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时也包括社会基金在内。

② 这被称为费尔德斯坦—霍利欧卡（Fieldstein—Horioka）之谜，他们在 1960—1974 年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了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间存在高度依存关系。

储蓄、安定的经济环境等)同时也是使 I 活跃起来的主要原因。此外,只要考虑到对外投资的风险,国内储蓄就很有可能转移为国内投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不景气时期政府的干预,比如采取促进投资的政策等,对 I 与 S 均衡化起到了重要作用^①。现实中存在着储蓄多的国家投资也多,经济增长率也高的关系,所以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必需的 I,就不能忘记自己国家的储蓄水平仍然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速增长期中(稳定地保持着固定汇率制),日本经常性收支的赤字得到抑制(国外的资本输入受限),国内的高储蓄率支持着投资。S 与 I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被称为费尔德斯坦—霍利欧卡之谜(Fieldstein—Horioka),在国际投资极其活跃的今天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因为现在是资本流动极其活跃的时代,假定现实中 S 与 I 依旧相互联动,那么这一事实就导出了下面的结论:国际间的资金流动存在着某种障碍,或者国际资本流动活跃这一说法是有疑问的。还因为人们开始怀疑下面这种认识:现在自由而活跃的资本流动使资本快速流向投资效率更高的地方成为可能,现在是提高世界经济整体水平的时代。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现在是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空前活跃的时代这一看法并不一定正确,这一点在展望今后的国际贸易时更应该加以注意。

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与现在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在金本位制下的资本流动更加活跃,那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时代。比如,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指出,与现在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常性收支的世界性不平衡部分占 GDP 的比值要大得多(也就是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的那部分用资本流动来弥补)^②。也有人指出,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就提到了华生博士热心海外证券投资的情景^③。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历史事件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混乱时代,那么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第一

① 河合正弘编写:《国际金融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p.80。

② 据 Solomon 说,1875—1914 年英国 2/5 的储蓄,后来为一半的储蓄投资海外,而且那时,法国 1/3 的储蓄被投资在海外(1996 年美国的海外资本输出还不到民间储蓄的 1/4)。1913 年英国的海外投资收益达到 GDP 的 10% (1996 年美国只不过为 3%)。参见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金钱驱使世界》,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 年,p.166。

③ Ronald McKinnon, Kenichi Oono, 《美元与日元》,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 年,p.178, Sherlock Holmes 短文集,1903 年。

次世界大战前表现为铁路与电信)，现代全球一体化影响之处所表现的情况就很值得我们关注。

2. 经常性收支的 I—S 平衡理论

恒等关系

上一节推导出的公式 $S_n - I_n = CA$ 表明，如果 Y 已知， S 、 I 、 CA 这些宏观变量之间存在着这一数式关系，从结果来看，这种关系经常成立，所以在此意义上它就成为了恒等式（因此，不管短期、长期、循环性、恒久性，这一公式都成立）。不过，这一等式关系并没有说明这些变量如何相互影响，哪个是原因（或成为外生变量），哪个是结果（或成为内生变量^②），即因果关系或过程没有在公式中表现出来。

比如，可以这样解读上述关系式：在某一时间， Y 是一定的， S 由 Y 即收入水平与利息而决定，而利息水平又决定投资 I 。这样，如果给出 Y 和利息，就能确定 S 与 I ，它们的差值即 CA 就可以确定（从左向右算）。

但是，其他解读方法不是像上面一样的宏观方法，而是首先着眼于影响进出口的要素（即竞争力强的商品，日元贬值等要素），这些是决定 CA 的要素。比如在出口主导的形式下 Y 的水平是确定的，结果，不否定 S 与 I 等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上述关系（从右向左算）。

对这一等式的解读方式不同，采取政策的基点也大不相同。日美贸易摩擦和日美结构协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一般来说，美方接近后一种理解方式，他们认为日本强大的竞争力，加上进口限制以及（不正当的）日元汇价低等因素扩大了贸易盈余，增加了日本的收入，结果带来了高储蓄、异常的经常盈余（参照后面的弹性方法）。

① Alex Guinness 主演的电影《环绕地球 80 天》，（原作者 Jules Verne）是受横穿印度的铁路竣工这一消息影响的故事（1872 年），它向人们展示了当时印度“由此成为世界第一”的氛围。世界第一条铁路为英国的曼奇斯塔铁路，它在 1830 年竣工，而美国的横跨铁路则在 1869 年竣工。

② 作为已知条件给出的变量叫做外生变量（exogenous）；作为结果给出的变量，即被说明变量称做内生变量（endogenous）。

I—S 平衡理论

与此相对，把 I—S 平衡决定 CA 水平（从左向右算）这一关系看做均衡式 模式化后，叫做 I—S 平衡模式。日本基本上接近这一立场，在 IMF 理事会上的讨论中，日方也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这些不同的观点从理论上或实证上都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下面，基于 I—S 平衡理论来理解一下日美经济争论在政策上或政治上的意义。

典型的 I—S 平衡理论是小宫理论，其要点如下：

为论述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国存在（或考虑日本与其他国家）的两国模式（不区分政府部门）。

(1) 对日本而言 $S(Y, a) - I(r, b) = CA(e, Y, Y', c)$ 。

(2) 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是 $I'(r', b') - S'(Y', a') = -CA'(e, Y, Y', c')$ 。日本与其他国家的 CA 肯定是数值相等而符号相反，所以表示为上面的关系式 $CA = -CA'$ 。

(3) 在国际资本市场自由流动前提下，从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看，储蓄和投资必须保持均衡。所以 $S(Y, a) + S'(Y', a) = I(r, b) + I'(r', b')$ ②。这表明在国际市场上资本供需即储蓄与投资保持平衡。一国的国际资本的流入与其他国家资本的流出量从世界总量来看总是保持总

- ① 依照会计原则，I—S 的关系是经常成立的恒等式，所以不管在大范围失业的情况下，还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都成立。但是，在考虑因库存或就业的调整，经济不断得到调整最后恢复到均衡状态时，这一关系式就成了表示储蓄、投资、经常性收支等宏观指数处于均衡状态的均衡式。
- ② 这种关系式经常出现在宏观议论中。比如，如果写做 $S(Y)$ ，表明储蓄 S 是收入 Y 的函数，即 S 由 Y 决定。上面出现的 $S(Y, a)$ 中有 a（大多使用希腊文的 α ），这是为了表示 S 也由 Y 以外的已知条件，比如金融体系、储蓄的便利程度等外在要素决定，为了方便而把 a 加上去的。同样，写做 $I(r, b)$ 是表示投资 I 是利息 r 的函数，因为投资不仅受利息的影响，还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所以为了用符号表示这些影响因素，以及表示假定该因素不变的和已知的条件，而把 b 加上去（通常叫做参数或者称之为辅助变数）。同样道理，比如 CA 是表示与外汇汇率 e、本国和别国的价格 Y 以及其他要素 c 之间的函数。而且，这种函数关系在反比关系下，比如价格上升而需求减少或者货币需求与利息成反比的情况下，要在变量前加上符号，比如需求（-价格 P）或者 L 货币需求（-利息 i）。这样，各种模式公式化同在联立方程式中求两个变量 x, y 的解一样，两个独立的关系式是很必要的。而且在上面的关系式中，a, b, c 表示外在的已知条件，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量的平衡。世界利息在这一过程中确定下来。

(4) 在(3)式的前提下,就会考虑现行的浮动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的状态。最后,本国利息 r 就同其他国家利息 = 世界利息一致了,所以,可以认为 $r = r'$ 。因此,可以认为上面虽存在 r 、 r' 两个变量,实际上是一个 r 。

(5) 这里讨论的是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即充分就业状态。所以,供给应该已经给定,根据供给确定了收入 Y 。由此, Y 和 Y' 在一定时期是已知条件。

这样的话,未知数只有 r (r' 也一样) 和 e ,所以只使用上列等式中的(1)和(2)就行。换言之,如果 Y 是确定的,那么 S 就是确定的。因为世界利息 r 是确定的,因此 I 由 r 决定。由此,日本的 CA 就确定了。

但是,这不是自己随便决定的,因为这一调整要根据 e 汇率而定,结果外汇汇率在两国 CA 一致的水平下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外汇汇率作为两国财产的交流比率而定。

政策意义

这一议论的政治意义如下:

(1) 在该国经济均衡状态下, S 与 I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这个差额决定了 CA 将来的水平。只要不给这一差额施加影响, CA 的基本值就不会改变。从历史上来看,两者间存在差距是有先例的,比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保持高达 GDP 的 5% 的经常性收支盈余。

后来提出的价格弹性法(认为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经常性收支盈余下降的观点^②)在一定程度上应称为局部均衡论,它不能处理经济经调整达到均衡状态的宏观状态。也就是说,把经常性收支问题当做贸易收支问题(进出口的问题)片面地加以考虑是错误的,应该讨论

① 为了简单起见,上面用了利息和汇率两个概念,但严格地说世界利息是真实利息,汇率也是从两国的相对价格计算出来的真实汇率。因此,有必要考虑调整名目和实质的关系,即使调整名目和实质, $S-I$ 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不变的。且在这种场合下, S 与 I 平衡理论解释了古典派宏观经济中的长期均衡原理,表明了真实汇率即为长期均衡的 PPP (购买力平均价格) 的关系。

② “弹性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应称为局部均衡论,它在解决宏观问题上不起作用。”“趋势性的储蓄,投资差额决定趋势性的经常性收支。”小宫(1994年)。

整体经济经过物价、失业等调整后的均衡状态（趋势性水平下的充分就业状态）。

下面计算一下日本趋势性的盈余部分：纵观日本经常盈余与 GDP 的比值可以看出，1980 年以前几乎为 0，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为 1.9%，80 年代后半期为 2.8%。由这一发展趋势可以推算出今后的增长率应该在 2%—2.5% 之间，根据这种趋势，日本经常盈余的循环部分不到 1%—1.5%。

(2) 在 S 与 I 均衡化的过程中，外汇汇率作为结果确定下来，而不是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外汇汇率的变动不是改变 CA 将来水平的因素。因此，日元升值政策，美国为削弱日本盈余而采取的对策，都不具备长期的盈余削减效应。

(3) 即使一个国家提高了竞争力（依靠引进先进技术等）、扩大了出口，也不能趋势性地扩大经常性收支的盈余。出口必须保持与对方国贸易的平衡，所以最终通过两国相对价格的调整，该国货币升值达到平衡。竞争力的增强与货币升值相抵消。

这样，I—S 均衡理论的基本点是讨论经济的宏观均衡状态。但是，经常性收支盈余中也有与经济情况不吻合的循环性部分。关于这个循环性部分，在 I—S 均衡理论上，凯恩斯认为，通过采取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达到 I 与 S 的均衡。比如，在经济不景气时，生产力过剩导致出口压力增加，消费低迷。在这个状态下出现 CA 盈余增加时，如果靠金融政策等经济刺激政策来扩大消费，就有可能削减循环性增大的 CA 盈余部分。只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不仅在一个方面影响 CA，而且它的效应也是短暂的。

总之，I—S 均衡理论，特别是小宫理论把趋势性盈余与循环性盈余明确分开加以讨论，而且针对不同的盈余采取不同的政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针对趋势性盈余采取循环性对策（尤其是把在公共投资方面应该长期讨论的财政政策当做循环性对策来考虑）的观点是错误的。

像这样把趋势性的东西和循环性的东西分开考虑的做法是一种容易调整的立场，但是联系实际就会发现，把趋势与循环分开这一做法本身就很难。美国按照后面讲的价格弹性方法，比如，采取日元汇价高的汇

① 关于小宫理论的主要内容，参见伊藤元重 / 通产省通商产业研究所编著：《贸易盈余的误解》，东洋经济新报社，1994 年。小官隆太郎：《贸易盈余 / 赤字的经济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94 年。

率政策有效地消除了盈余。日美在 $I - S$ 均衡理论的弹性性方法上看法不一，其实是两国对循环部分所占比重的看法有分歧。美国方面认为结构性、趋势性的部分最多只占 1.5%^①。

3. 储蓄和投资的调整

储蓄和投资的调整问题

由上可知，为了长期持续性地给 CA 以影响，我们必须采取能同样长期且趋势性地影响 S 与 I 的宏观政策。但是，究竟目前采取何种具体政策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有关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日本如果急速增加 I ，盈余就会减少，一般来说，在景气循环 I 的影响下，经济情况会有所变动，但大的趋势是不会骤然发生变化^②。

关于储蓄，美国应该增加 S （家庭储蓄 + 企业储蓄 + 政府储蓄），其中，企业部门本来不是储蓄部门而且储蓄比较稳定，所以基本上不算在大宗储蓄内。

这里的问题是家庭部门的储蓄。家庭储蓄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储蓄

- ① 根据后面讲的吸收方法，在 Y 不变的情况下，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后，国内投资和消费扩大，即吸收扩大的话， CA 的盈余就会缩减。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使失业者减少， Y 也会随之扩大，那作为结果的 IS 差额以及 CA 会怎样呢？这不是根据单方面因素而定的。假如说收入增加引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表示收入增加 1 时，消费和投资增加多少）是已知的，那么，随着 Y 的扩大储蓄和投资也都确定了，但它们的差额 CA 却不明确。现在把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相加之和作为边际支出倾向（ c ），假如 $1 - c$ 即社会整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为正数的话，那么，经常性收支的盈余就会增加（若为负数则减少）。像这样讨论收入的变化和社会整体的消费，投资倾向之间关系的方法叫做开放经济下的凯恩斯方法。但是，如果经过这个过程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上述的 IS 均衡理论就成立。
- ② 企业部门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储蓄部门，所以日本的 IS 差额经常为赤字（经常性收支减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投资增加（企业部门的 IS 均衡恶化）， CA 盈余的减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时期日本财政部门的财政赤字不断减少，成为盈余增加的主要原因。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90 年代企业部门的 IS 差额无疑表明了赤字减少的倾向，这成为现在日本经常性收支盈余的主要原因。

比例) 长期以来到底是由什么主要原因决定的? 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定论。为什么某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比如日本原来超过 20%,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呈现下降趋势, 现在为 16%—17% 左右), 而其他国家为什么这一比率却相对较低呢? 对这个问题有多种看法, 但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据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 3%—4% 的水平, 而近年来骤然下降为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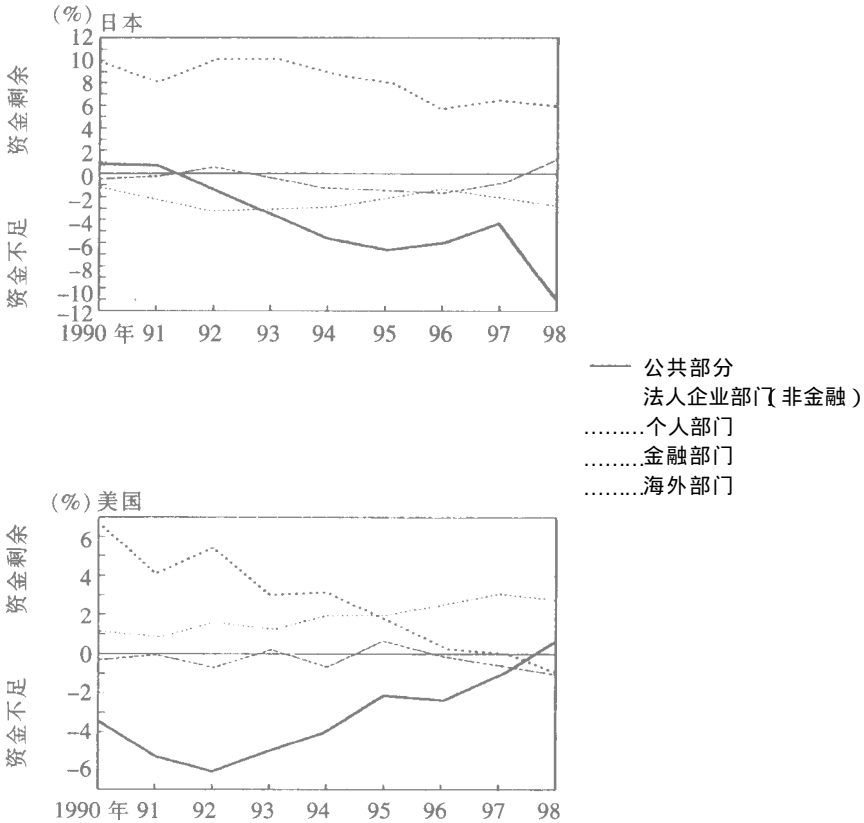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特别是新古典派的看法), 储蓄根据收入的增加以及利息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也不例外。的确用上面的说法可以部分地解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收入急速增长期的高储蓄率。但是, 为什么现在日本收入水平稳定居高(或逐渐降低), 即使利息偏低, 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呢? 如果利率水平低于通货膨胀水平, 储蓄欲望就减退这一点是很明朗的。一般来说, 为了维持、提高储蓄水平, 至少要满足利息相对于物价上涨为正数的条件。一般来说, 在发展中国家, 通货膨胀水平高, 利息是负数的情况居多。这又经常使得经济瘫痪, 出现储蓄减少、I 停滞不前的情况。此外, 像以前的日本那样,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低利率政策时, 多采用降低存款利息的形式(叫做金融抑制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负利息。

在某种储蓄形态(比如小额储蓄或购买国债)下, 为增加储蓄采取优惠的税制, 也可能只会招致储蓄形态下的舍小取大。这种政策是否有效, 令人怀疑。此外, 认为日本社会的老龄化使储蓄减少的观点是错误的。有研究认为, 现在日本长时间的不景气更加助长了人们对年老后的不安, 使储蓄率增高^②。

在美国, 使用信用卡非常方便。而日本的社会体系则有问题, 比如奖金制度推动了储蓄的发展等。在美国, 人们认为个人借款表明个人信用, 而亚洲国家尤其日本特有清贫思想等文化(在日美协议中曾讨论过日本 ATM 的开放时间短是阻碍消费的主要原因)。总之, 影响家庭储蓄将来水平的主要原因大多数都还没有明确。

① 据日经报纸报道, 美国商务部发表报告说, 从 1999 年 12 月开始连续 6 个月家庭储蓄率一直为负数。但是之后改变了统计方法, 用新方法统计出来的结果是 1999 年储蓄率为 2.4%, 比前年减少了 1.3%, 是 195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② 中川忍:《为什么进入 90 年代以后日本的家庭储蓄率高?》, 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日本银行调查月报》1999 年 4 月号。日本现状是储蓄的生活方式论(年轻时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 到年老时, 随着收入的减少便坐吃山空的假说)的一个例外。



注：资金的剩余与不足，表示各部门的金融贸易结果，资金不足（金融负债纯增）指在非金融贸易上的投资过多，资金剩余（金融资产纯增）指储蓄过多。海外部门的动向是指从对方国家的立场来看该国的国际收支，资金不足是指该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目）为盈余状态。

资料：日本中央银行国际局编，《以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1999年。

财政收支的动向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储蓄、投资的平衡。日本预计今后因养老金、医疗问题等原因，政府的 I—S 均衡将急剧恶化^①。那样的话，维持日本的

① 现在，赤字水平大约是 GDP 的 8%。IMF 预算，假如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停滞不前的话，财政赤字将会达到 GDP 的 15%—6%。

国民生活或民间储蓄水平是很重要的。

通观世界，可以说世界整体的 I 和 S 应该保持着均衡，日本的高储蓄率对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资金通过资本流动对弥补发展中国家为首的储蓄不足状况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盈余有用论）。

在美国，政府的储蓄均衡（收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急剧转为赤字，它与经常性收支的赤字一起统称为双赤字。最近财政转为盈余状态，但出现了民间部门消费过剩的问题。

而且，众所周知，民间、家庭储蓄率的动向与财政收支之间在着实证上存在非对称性关系（即等价原理，也被称为巴罗—李嘉图等价原理）。这从经验上表明了财政变得散漫或成为赤字后，民间储蓄率就会上升（反之也一样）。这也可以解释为财政收支的恶化让我们预期到将来税费的增加，所以在民间就会防卫性地提高储蓄率。有人按照同样的方法分析，认为现在的（1998 年后的）美国民间储蓄率骤减反映了财政收支的好转。比如，IMF1999 年报道说，美国最近家庭储蓄率降低的最大原因（35%）是股票上升造成的资产效应^①，用上述的巴罗—李嘉图假说可以解释其中的 30%。此外，信用卡使用的方便性作为主要原因达到 15%。

消费时间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消费、储蓄水平最终作为某一时间的趋势而逐渐确定。即由该国对消费选择的倾向性（消费倾向、对可支配收入消费的比例），或者对推后消费选择的倾向性来决定。

现在尽量少消费，而把消费向后推的消费选择叫做时间选择。越推后消费，时间选择的机会就越小，日本人正好属于对消费的时间选择机会小、容易忍耐的国民，而且对消费的时间选择很难一下子就改变^②。

- ① 人们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消费热主要是由股票上涨的资产效应引起的。所谓资产效应是指因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而让人感到富裕了，从而扩大消费。反过来，比如日元汇价低意味着名目（金融）资产价值降低，带来反资产效应。
- ② 把当前收入的一部分立刻（现在）拿去消费，剩下的为满足将来消费而储蓄起来，即金融资产化。因此，所谓消费时间的选择就是如何选择现在与将来的分配问题，时间选择机会小意味着减少现在的消费。与此相对，将来的消费增大。反之，时间选择机会大指只要不期待将来有大量的回款，就不会刺激现在受抑制的消费。

4. 有关增加出口政策的争论点

进口优惠政策的效应

如果从宏观变量的关系来讨论进出口，单纯对进口产品采取某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即增加进口额，与此相等的 CA 也不会减少。

用图式来说，比如想增加意大利领带的进口额，只要全国的领带消费不扩大，CA 盈余就不会减少。一般来说，某一种进口产品的消费扩大后，国产同类产品的消费就会减少。因为存在这种产品在国内继续生产的前提（即收入 Y 不变的前提），宏观上来看，与进口相对应的部分，即国产的剩余产品必须出口。但是现实中，在消费不变的前提下，一旦进口增加，国内的领带生产厂家就会破产，进而导致失业。在此情况下，国家的收入就会变化（减少）。但是，随着经济的调整，失业者应该会长期从事别的生产，经过这样的过程，只要经济恢复到均衡状态，只要收入与生产恢复，消费倾向不变，CA 也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比如，应该充分注意对美国牛肉进口量增大引起盈余削减的议论。这些议论与要求日本扩大进口的日美经济争论息息相关。

前川报告

前川报告（1986年4月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①报告）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开放市场等来扩大进口，减少 CA 的盈余。但是，用 I—S 均衡理论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点。有批判说前川报告没有明确指出采取这些政策后，I—S 差额长期内会如何变化。除此之外，前川报告认为日本经常盈余“具有危机性”。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

^① 以原日本中央银行总裁的前川春雄为主席的研究会。1985年日本的经常性收支盈余达到 GNP 的 3.6%，会议认为这是一种危机状况，通过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来调整对外不均衡状态是国际协调所必需的。因此，前川提议：从根本上扩大内需来扩充社会资本，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改善市场进入状况，促进日本产品进口以及推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进程。此报告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经常性收支水平，但认为要达到 GNP 的 2% 左右。

疑。还有人批判说，为了通过这种扩大内需的政策来达到削减 CA 的目的，必须做到 GDP 的飞速增长或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而这是不现实的^②。如此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意味着为达到对外均衡而国内均衡却出现问题，所以，为避免这种状况，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改变汇兑政策，即应该转为日元汇价高的政策。前川报告的发表是为了避开 1986 年“广场协议”后一直持续的日元汇价高的压力，所以报告没有涉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日美结构协议

日本进口增加是进口日本擅长的产品（即产品进口），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日本的贸易商品业，使得日本产业的出口能力丧失，出口量减少。但是，如果进口增加仅仅冲击贸易商品部门的话，就会出现国家整体的生产量减少→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所以可能会造成进口量下降。因此，这种进口的增加，特别是产品进口的增加不仅冲击贸易商品部门，还会使日本的资源/劳动力迅速流动到非贸易商品部门，即服务业占据了优势地位，这样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如果这样的话，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的维持、进口水平的维持就成为可能，从结构上来说日本可能会变成进口容易增长的国家。上述议论正是在美国盛行的所谓日本结构改革论。

有人指出，最近日本的产品进口额超过了 50%（其他先进国家接近 80%）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此外，日本的产品进口大多是从对外投资地运来的再进口产品，从技术上来看多为中低档产品（高档/高价产品仍然是从日本出口到国外）。正如前所述，冲击日本的贸易商品部门的可能性小。

美国也经常议论这种想通过日元升值来推动结构改革的政策。

总之，日元一旦上升，进口产品就变得比国产产品便宜，所以对国内

- ① 因为 CA 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只有收入增加，国内吸收才会扩大。
- ② 饭田经夫：《日本的反省》，PHP 研究所，1996 年，p. 115。书中使用了日本进口依存程度这个概念，认为 1985 年为了消除约 500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就必须达到 32% 的年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接近 30% 的年通货膨胀率。
- ③ 支持这种日本异质论（即拥有特殊规则或干预障碍的与众不同的国家）的立场被叫做修正主义（Revisionism）。
- ④ 同扩大产品进口一样，产品进出口的竞争在产业内部贸易中很激烈。比如在欧洲的法国与德国相互进出口同属一种产业的汽车。欧洲各国的这种产业内部贸易很频繁，进出口总额在 GDP 中的比例很高。